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在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刘胡兰村（原名云周西村）的刘胡兰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碑高12米，寓意着让世人永远铭记1947年1月12日这个沉痛的日子。纪念碑由汉白玉制作而成，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八个镏金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背面刻着郭沫若书写的关于刘胡兰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晋绥分局关于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刘胡兰同志，一九四六年六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十四岁。入党后，对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特决定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 郭沫若书

毛泽东的题词高度赞扬了刘胡兰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表达了对刘胡兰的崇高敬意。中央晋绥分局的追认决定高度概括了刘胡兰英勇抗敌，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献出年轻而宝贵生命的壮举。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农民家庭。她年纪虽小，却十分懂事，主动承担家庭重任，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生活的艰辛磨砺出刘胡兰坚强独立、吃苦耐劳的品格，对于别的同龄孩子不敢干的事，她却敢作敢为，十分讲求与敌人斗争的策略。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文水县城。4月，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帮助下，文水县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党支部，共产党员顾永田任县长。在一次战斗中，顾永田负伤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成为刘胡兰一生学习的榜样，更加坚定了她对革命的信念。

1939年，云周西村成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涌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他们积极为抗日贡献力量，担负起运输粮食、传递情报和掩护干部等任务，保障了根据地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8岁的刘胡兰进入村办抗日小学读书。在校期间，刘胡兰不仅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从老师那里了解到许多革命道理。不久，由于形势严峻，学校被迫停办，刘胡兰终止了学业，但她并没有放弃学习。回到家里，继母胡文秀继续教她识字读书，“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这些词最早就是她从继母那里学会的。

1942年，刘胡兰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救国儿童团”，并成为儿童团团长。此后，刘胡兰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她和儿童团的其他成员一起为八路军运送情报，掩护党员干部秘密穿过封锁线，在村子里站岗放哨，时刻关注敌人动向。虽然不像其他八路军战士和革命同志冲在第一线奋勇杀敌，但是刘胡兰



和团友们所做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刘胡兰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革命觉悟也大为提高。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同年9月，文水县城获得解放，云周西村也从硝烟战火中解脱出来。1945年秋，刘胡兰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在那里，她学到了更多的本领。回到村里后，她被任命为妇女救国会秘书，积极帮助村里的妇女解放自己，提高革命觉悟，开展了一系列妇女运动：教妇女读书识字，带领妇女做衣服鞋，照料前线伤员等。刘胡兰多次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肯定。1946年6月，年仅14岁的刘胡兰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候补党员。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党部队对我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尽可能减少伤亡，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只留下少数武工干部，其余人员全部转移上山。

接到上级命令后，刘胡兰没有选择撤离，而是以自己当地情况熟悉为由要求留下，上级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此后，刘胡兰利用自己年龄较小且女性身份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附近村庄的党组织秘

密运送文件、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并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1947年1月8日，敌人来到云周西村抓走了石三槐等人。由于叛徒告密，刘胡兰的身份暴露。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上级掌握这一情况后，要求刘胡兰尽快转移上山。

1月12日，正当刘胡兰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之时，敌人已将云周西村团团围住。刘胡兰知道自己已无法脱身，便随着村民来到村里的观音庙前，敌人在人群中认出了她并将其抓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刘胡兰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党的秘密。随后，敌人在庙前广场上用铡刀将几人铡死，以此恐吓刘胡兰，告诉她：“你说出共产党员来，就不杀你了！”刘胡兰说：“我死也没说的。”最后，刘胡兰自己走向铡刀。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5岁。

1947年3月25日，在转战陕北途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英勇事迹。毛泽东听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遒劲大字。1957年1月，在刘胡兰牺牲十周年时，毛泽东再一次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成为毛泽东一生两次为其题词的革命烈士。

(李雨西)



军史文物

一篇光辉文献的诞生与传播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展陈着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多个版本。这是一篇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一经发表即受到全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民众以及海外人士的高度评价。

1938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和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敏锐洞察力，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对时代特点的分析，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精辟地论述了抗战的前途、历程和战略战术原则，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从而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全文共120小节，论述了21个问题，包括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抗日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内容。这篇文献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

持久抗战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到1938年5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十分渴望战争的胜利。可是，对于战争的过程，以及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取得胜利，不少人处于迷茫之中。更消极的是，当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甚嚣尘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对我国坚持长期抗战将十分不利。因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为了探索指导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方略，毛泽东阅读多种哲学和军事著作，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而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

为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只要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哲学书籍，他都认真进行研读。因为他深知，在抗日战争中，社会上之所以流传着许多错误的观点，是因为人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毛泽东阅读众多哲学书籍，增加知识储备。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在书眉和空白处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在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时，毛泽东更是一气

看完，专门撰文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推荐，并重点探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对中国古代军事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在延安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采取边读书边讨论的方法展开深入学习。毛泽东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务求通过研读《战争论》以及其他军事著作，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这也是《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有所反映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掀起一阵翻译和学习《战争论》的热潮。

《论持久战》通篇充满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研究和分析抗日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研究和分析敌我双方存在的矛盾，以及造成这些矛盾的种种因素，从而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走向，即：“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发行单

本《论持久战》，各根据地官兵争相传阅。当月，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相继出版印刷订正本。一时间，《论持久战》供不应求，一扫国人心中的迷茫。

《论持久战》不仅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将其基本精神向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了介绍。傅作义等人深为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随后，经周恩来的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中所蕴含的思想“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引起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从武汉寄了一本给在香港的宋庆龄，请她帮忙翻译成英文。读完文章后的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记者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论持久战》在海外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国际影响力。

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和付出，通过深入研究，将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升华为高度的理论概括，写出了正确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践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回答了当时人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解决了当时人们解决不了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的未来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和信心。

(缪炳法)

战争岁月

辽宁锦州：文化公园里重温配水池战斗

3月的锦州城，乍暖还寒。从锦州老城区沿着人民街一路向北，坡道渐陡，人流渐少。

“离这儿不远，那就是‘配水池’。”在路人的指引下，人民街西侧的一片高地映入记者眼帘。几年前，这里是被平房与砖墙环绕的辽沈战役时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的屏障。

此时，阳光明媚的广场上，游人三三两两，有的在广场漫步游走，有的推着婴儿车，沐浴着阳光。幸福之感穿透四周密植的草木，四溢开来。

配水池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一处供水设施。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又靠近公路，成为辽沈战役时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的屏障。

这是一场恶仗——1948年10月12日8时，配水池战斗打响。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东北野战军先后击退敌军30余次反扑，攻占了配水池。战斗结束时，我军伤亡600余人，一线部队只剩下5名战士和1名随军记者。配水池战斗打开了锦州城北的门户，为攻克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并未远去。配水池外墙上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弹孔是这处遗址亲历枪林弹雨的明证。

为了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铭记英烈，2019年，辽宁省政府部署实施革

命文物保护工程，锦州市加大配水池战斗遗址周边环境整治力度，修复了配水池战斗遗址，同时建设了内容丰富的陈列馆，并将公园与红色遗址有机融合。如今，整个遗址保护面积达6.7万平方米，不仅成为红色遗址展览地，同时也是市民游客休闲地。

从一个遗址变成一处公园，从一段历史变成永久记忆，锦州打开一个点，连成一个片，让人们置身其中，身临其境，通过今昔对比，所见所感，发自内心的感悟到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锦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曙光说，经过几年的运行证明，对配水池战斗遗址活化利用所收到的成效远远超出最初想象。

陈列馆内，一对来自北京的年轻夫妇在历史照片与革命文物前驻足且行。庄严肃穆的展馆内，一张张历史照片，一段段文字，让这对年轻夫妇不住地唏嘘慨叹。“之前不太了解这段历史，走近了，才会觉得今天幸福生活的珍贵。”丈夫张盛凯这样说。

陈列馆外，阳光明媚，岁月静安。辽宁省去年启动10项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工程，积极探索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经验，发挥文物融入社会、传承文化基因作用，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达到新水平。

(朱忠鹤)



中华英烈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叔侄英烈

胡福才(1913—1941年)和胡德林(1917—1941年)，河北省容城县平王乡郭村人，俩人相差4岁，胡德林叫胡福才叔叔。俩人立志抗日救国，于1938年同时参加八路军。1941年，叔侄俩在狼牙山阻击战中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出生苦难立志参军报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容城沦陷，日军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个县城被洗劫一空。胡福才、胡德林与城里的百姓们外逃，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1938年，八路军突然出现在容城附近。胡福才、胡德林听到后立即赶到城外，带着八路军运弹药、抬伤员、送水送饭。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容城终于被八路军攻下，日军弃城而逃。第二天，恰逢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队在县城内扩军，叔侄二马前去报名。不久，俩人被分到了新兵连同一个班。他们很快掌握了各项军事技术，跟着胡队长先后转战冀东、冀西，最后被分在了七连二排六班。战斗中他们身手矫健，出生入死，勇猛果敢，多次得到上级的记功嘉奖。

1940年春天，叔侄俩参与了狼牙山三条环形小道的改造，依据地形构筑了隐蔽工事，开辟掩体和通道，在各险要处设置了障碍，把多个险要关口变成敌人望之却步的要卡，狼牙山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这为1941年八路军赢得三次反“扫荡”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加粉碎“铁壁”破“合围”战斗行动

1941年8月，日军调集重兵7万余人，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西平地进行大“扫荡”。9月24日清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伪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对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在地狼牙山进行包抄，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梳篦式清剿”。

为转移两万多的游击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以及周边村庄的群众，杨成武司令员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以应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战术。狼牙山西南的三团和二十团从正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一团就可趁机掩护团部的游击队员与群众从狼牙山东北角的碾子台、沙岭子一线拐出来的缺口处突围。当然，还要留下一个小分队以阻击牵制敌人，让敌人误以为自己一直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从而把敌人主力牢牢地拖在狼牙山，这个“疑兵”的任务交给了胡福才和胡德林所在的七连。

随后，马宝玉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纵身跳下悬崖。胡福才、胡德林等战士们，凝聚起身上的最后的力气也跳进了大山深谷，演绎了一曲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壮歌。

(胡琳玉)

纵身跳崖壮举震惊狼牙山

太阳渐渐偏西，随着战斗的推进，子弹和手榴弹已经所剩无几，六班的战士们只能打边炮。此时，胡德林看到山下“背药旗”正铺在地上，旁边铺展开一块硕大的红布——这是日军在给飞机报信，打算开展山地作战了。果然，过了一会两架飞机开始盘旋于狼牙山的上空构筑了隐蔽工事，开辟掩体和通道，在各险要处设置了障碍，把多个险要关口变成敌人望之却步的要卡，狼牙山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这为1941年八路军赢得三次反“扫荡”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春天，叔侄俩参与了狼牙山三条环形小道的改造，依据地形构筑了隐蔽工事，开辟掩体和通道，在各险要处设置了障碍，把多个险要关口变成敌人望之却步的要卡，狼牙山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这为1941年八路军赢得三次反“扫荡”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8月，日军调集重兵7万余人，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西平地进行大“扫荡”。9月24日清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伪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对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在地狼牙山进行包抄，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梳篦式清剿”。

为转移两万多的游击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以及周边村庄的群众，杨成武司令员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以应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战术。狼牙山西南的三团和二十团从正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一团就可趁机掩护团部的游击队员与群众从狼牙山东北角的碾子台、沙岭子一线拐出来的缺口处突围。当然，还要留下一个小分队以阻击牵制敌人，让敌人误以为自己一直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从而把敌人主力牢牢地拖在狼牙山，这个“疑兵”的任务交给了胡福才和胡德林所在的七连。

随后，马宝玉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纵身跳下悬崖。胡福才、胡德林等战士们，凝聚起身上的最后的力气也跳进了大山深谷，演绎了一曲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壮歌。